

【社工实务】

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下 都市单身青年婚恋态度

姜振华 琚晓燕 李燕平

【摘要】根据期待婚恋程度以及择偶状态的不同,本文将都市单身青年的婚恋态度分为五种类型。通过对北京市单身青年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当比例的单身青年持有负面婚恋态度,或焦虑,或佛系,或恐惧,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婚恋迷茫中。本文从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出发,以“人在情境中”为分析框架,从个体、社会环境、个体与环境互动三个层面系统性探究了单身都市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生成规律和机制。为此本文建议采取系统性、整合性的干预之道,从实现青年个体增能、促进青年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营造包容支持的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解决青年的婚恋问题,促进单身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理性的婚恋态度。

【关键词】都市单身青年;婚恋态度;整合取向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姜振华,琚晓燕,李燕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中国青年研究》(京),2024.3.42~5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科研专项“青年婚育观的新特点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666180201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恋爱和婚姻是青年成长历程中所面临的重要人生课题,婚恋的顺利与否不仅影响着青年个体的幸福,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人口的再生产。进入后疫情时代,面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就业形势严峻所带来的不稳定性、逆全球化和信息化双重叠加所带来的高度竞争性,青年尤其是都市青年在婚恋领域正经历着更多的挑战和困境,其婚恋态度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一方面,传统的婚恋观受到很大冲击和挑战,结婚不再是青年的人生必选项,部分青年对婚姻的态度越来越消极,“懒婚”“恐婚”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另一方面,青年在步入婚姻殿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更加突出,婚恋成本剧增、很难找到合意伴侣等问题成为都市青年的突出婚恋困扰,造成了部分青年的婚恋焦虑。

近年来结婚率的逐年下降和适婚青年结婚延迟现象的加剧,是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鲜明体现。通过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测算发现^[1],20~24岁年龄段、25~29岁年龄段、30~35岁年龄段的单身比例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中同龄组别分别增加了11%、15%和7%;其中大都市适婚青年的结婚延迟现象更为突出,以北京市为例,25~29岁年龄段的单身比例比全国同年龄段高出18.5%,30~35岁年龄段的单身比例比全国同年龄段高出8.3%。

大都市的人口异质性强、社会流动频繁,青年圈层结构复杂,青年婚恋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多元,在婚恋态度方面呈现出的问题要比中小城市更为典型和突出。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北京市单身青年婚恋态度及其相关问题,本研究于2022年4~5月,对北京市18~35岁且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单身(无恋爱对象)青年的婚恋问题开展了实证调查,资料收集方

法为问卷调查法和焦点小组法。综合考虑性别、职业、城乡等因素,研究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4523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婚恋态度、择偶观、婚姻家庭观及婚恋服务需求等。访谈对象的选择采用目的性抽样原则,以焦点小组的形式开展了2次半结构化访谈,共访谈各行业青年10位。为了明晰不同婚恋态度之间的边界,更加精准剖析单身青年的婚恋态度,在文献梳理及前期访谈的基础上,根据期待婚恋程度以及择偶状态的不同,本研究将持有不同婚恋态度的单身青年分为五种类型:期待婚恋的积极理性者、期待婚恋的忧婚者、不拒绝婚恋的懒婚者、不拒绝婚恋的恐婚者以及拒绝婚恋的不婚主义者,并对这五种态度确立了相应的测量指标。“积极理性”态度的测量指标为“期待美好伴侣,对于找对象抱有积极主动态度,结果随缘”;“忧婚”态度细分为“因经济压力而焦虑”和“因匹配难而焦虑”两种态度,“因经济压力而焦虑”的测量指标为“期待美好伴侣,但谈恋爱需要经济基础,经济实力还不够”,“因匹配难而焦虑”的测量指标为“期待美好伴侣,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懒婚”态度的测量指标为“不拒绝恋爱/结婚,没时间没精力找对象”;“恐婚”态度的测量指标为“对两个人的相处恐惧,害怕被辜负,没有勇气走入恋爱和婚姻”“期待恋爱,但对婚姻恐惧”和“推迟恋爱和结婚,不想过早承担恋爱和婚姻带来的责任”;“不婚主义”态度的测量指标为“拒绝恋爱/结婚,坚定的单身主义者”。调查发现,这五种类型的青年占比分别为14.7%、34.1%、30.6%、11.6%、2.1%。

“积极理性者”对待婚恋的态度积极乐观,心态健康平和。“忧婚者”是指期待步入婚姻却因经济压力或未能找到合意伴侣而陷入择偶焦虑的青年,其中有14.2%的青年属于因经济压力而焦虑的“忧婚者”;有19.9%的青年属于因匹配难而焦虑的“忧婚者”。“懒婚者”是指对恋爱、结婚虽不拒绝但也不主动、缺乏进入婚恋内在动力的青年。他们并不会为了寻找“另一半”特别努力,而是持一种懒得深究的佛系态度。“恐婚者”是指认为婚恋可能带来经济、情

感以及责任束缚等风险而感到担忧和害怕的青年,他们常常对婚恋持有负面认知和预期,恐惧婚恋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不婚主义者”希望在生命历程中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不再认为“结婚生子”是人生必需品,希望将时间和精力投入个人事业与兴趣爱好中,“不婚主义”是青年基于自身境遇所做出的自主选择,社会对此应持有包容、理解的态度。总体来看,有相当比例的单身青年持有负面婚恋态度,或焦虑,或佛系,或恐惧,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婚恋迷茫中。

研究表明,处在婚姻里的人,与单身的人相比,身体更健康,总体幸福感更高。青年的负面婚恋态度会抑制结婚意愿,这或将导致不生育或生育推迟,拉低总和生育率,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当青年的婚恋问题突破私人领域,对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时,它就不再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而是成为“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社会工作聚焦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于青年婚恋问题的解决能够发挥独特的专业优势。因此,本文以北京市单身青年为例,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着重探讨都市单身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成因及干预策略,这对于应对青年婚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对于都市单身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关注和研究,一直以来大多集中在因婚恋难而产生的婚恋焦虑。青年的婚恋难既受制于许多客观因素^[3]:婚恋的经济负担重、交际圈小、工作压力大等,也和青年婚恋观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趋于功利和理性的择偶观^[4]、宁缺毋滥的择偶心态^[5]、个体本位的婚恋抉择观等^[6]。客观社会结构因素和个体主观因素的相互交织,可能会造成“婚恋意愿高”的青年人“结婚意愿达成的失败”^[7],因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青年婚恋焦虑。一项关于上海青年婚恋焦虑的研究发现:婚恋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呈现“低龄化”趋势,婚恋经济成本太高是男青年婚恋焦虑的主要原因^[8]。女性大龄单身青年的年龄焦虑现象尤为凸显,关于“剩

女”的研究普遍表明大龄单身女性因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而被冠以污名化的称呼,“在父权制话语霸权下,遭受着大众媒介所制造的舆论裁决,易产生年龄焦虑等心理”^[9]。美国学者的研究也发现青年的婚恋焦虑呈现出性别差异,“需要挣更多的钱”“结婚前要实现职业目标”是男性婚恋焦虑的主题,而女性更“焦虑婚姻会失败”^[10]。

与期待婚姻的青年在面临择偶难时出现的婚恋焦虑不同,近年来随着“单身潮”和“晚婚潮”的兴起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很多青年在面对婚姻抉择时出现了犹疑、拖延、恐惧的消极态度,这种新现象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青年在面对“理想婚姻不可得”时对婚姻的冷淡态度与社会、父母对婚恋热切关注形成了鲜明对比,形成了青年婚恋领域的“态度失衡”。我国学界常常用“恐婚”“懒婚”“不婚”等概念来提炼分析青年的上述负面婚恋态度。虽然这些概念的内涵各有侧重点,但在外延上却存在相互交叉的情况,都被用于总体性分析和描述与婚姻延迟现象相关的各种负面态度和行为。国外的相关研究发现青年的负面婚恋态度会成为单身或晚婚的催化剂,对日本青年成为单身历程的一项纵向研究表明:择偶搜寻期延长和工作家庭平衡的压力导致青年对婚姻的态度模糊消极,因此,有2/3的青年成为“滑落至单身”(drifting)的人群^[11]。

国内关于青年负面婚恋态度成因的研究,大致可以从社会客观制约性与个体微观能动性两大视角进行梳理和概括。结构性视角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性因素对青年婚恋预期与决策的影响。大城市房价的不断飙升让很多出身底层的优秀青年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婚恋决策^[12];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裹挟下青年择偶过分强调对物质标准的单向度追求^[13];大众传媒中关于婚恋的负面舆论环境加剧了青年对亲密关系的恐惧^[14]。主体性视角着重探讨观念、价值、心理动机等主体因素如何影响青年的婚恋态度。对婚恋不积极的态度是部分青年为了对抗现代风险而将时间精力投入工作的理性选择^[15];“边焦虑、边躺平”的纠结矛盾婚恋态度^[16],则源于青年人

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共存和拉扯之间的彷徨和迷茫。国外关于青年负面婚恋态度成因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理论视角展开。一个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17]。随着个体化、世俗化、性别平等以及消费主义的发展,婚姻对个体尤其是对处于高社会阶层的青年来说变成了生命历程的可选项。另一个是“计划行为”理论^[18]。外界因素限制了个体对婚姻的控制感,这些因素包括不稳定的就业市场、高知女性及低社会地位男性的婚配困难、职场作为一个认识潜在结婚对象的机会缺失等,因此,个体进入婚姻有力保障的缺失阻碍了结婚意愿向结婚行为的转化,造成了青年的婚恋焦虑。

既有研究大多用一个总体性概念描述和分析青年的负面态度,但负面态度背后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复杂多样,大而化之的概念提炼可能会模糊不同类型负面态度之间的边界,误导公众对于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从类型学的角度对青年的负面婚恋态度进行更为深入精准的剖析。青年的婚恋态度是个人生命历程和宏观社会结构双向互动的产物,而目前从整体性、系统性、互动性的角度考察青年负面婚恋态度成因的研究则相对欠缺,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客观视角和主观视角,综合性探讨青年负面婚恋态度形成的深层次规律和机制。从学科视角来看,现有关于负面婚恋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的相关领域,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对青年婚恋需求的深刻把握,在对策研究方面较为薄弱。

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美国发展的一种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它模糊了传统社会工作方法的界限,用系统整合的视野解决处在复杂社会情境下的问题。它立足通识(liberal arts)和“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的框架,认为个人和资源系统之间的互动可能是构成问题的原因。“人在情境中”的分析框架认为应将个体及其行为置于所处的环境中,关注影响个体及其行为的微观因素(如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如社会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等,并关注这些因素之

间的互动关系,用系统的方法分析处于情境中的人。因此,“人在情境中”包括三个要素:个体、环境、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运用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不仅可以系统性考察单身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影响因素,而且能够更加完整地评估单身青年在婚恋中的问题与需求。因此,本文从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出发,在对不同类型青年负面婚恋态度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个体、环境、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这三个层面系统性探究负面婚恋态度是如何生成的,并以青年婚恋的问题和需求为本,提出系统性、综合性的干预之道。

三、影响单身青年婚恋态度的个体内在动因

婚恋态度是个体对恋爱、婚姻的评价与反应方式,这种评价和反应方式往往受到个体基于婚恋相关直接和间接经验而产生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的影响。由于近年来离婚率的增加以及大众媒体的过度渲染,部分青年夸大了婚姻的风险、冲突与伤害,形成了非理性的婚恋认知,造成恐婚;有些青年赋予了婚姻过于理想化的期待,当现实无法回应这种过高期待时产生“懒婚”心态;还有些青年受到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秉持功利主义的婚恋价值,加之大城市较高的婚恋经济成本,部分青年因物质因素对婚姻“忧心忡忡”。除此之外,婚恋能力也会影响个体的婚恋态度。当个体赋予了婚恋更多的功能,但缺少与之匹配的交友及关系经营的能力时,也会导致青年在婚恋中选择拖延和回避等态度。

1. 非理性的婚恋认知

“恐婚”者对婚姻的恐惧来自对婚姻无法长久的担忧。本次对婚姻观的调查中,对于“婚姻就该天长地久”的观点,53.8%的单身青年表示赞同,说明多数青年依然追求婚姻的安全感。但是,青年作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边际人常常会遭遇新旧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他们既试图在现代婚姻的脆弱性中寻求感情的确定性,又希望在高质量的婚姻生活中保持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因而在理想浪漫爱情和现实婚姻生活的矛盾中形成了对婚姻既希冀又恐惧的复杂心态。这种矛盾心态来自青年无法弥合在压缩的

现代化背景下新旧两种爱情脚本的冲突,“他们既想要旧脚本中天长地久的稳定,又想要新脚本里拥有的激情”^[19],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认知使得青年在现实婚姻稳定性下降的风险冲击下变得消极回避。

“恐婚”者对婚姻的另一个恐惧来自对承担婚姻角色带来的责任、束缚、冲突以及伤害的惧怕。近来大众媒体关于婚姻的各种负面报道使得很多青年尤其是女性青年在涵化环境中形成了对婚姻风险的灾难化思维。例如,一位女性受访者谈道:“经常在电视上或者新闻上看到各种家庭矛盾,还有家暴和杀夫杀妻之类的恶性事件。现在婚姻给我留下的都是一些不太美好的印象。”婚姻中的潜在风险在网络媒体的传播、渲染和放大后,导致部分青年对婚姻形成了各种以偏概全、绝对化的非理性认知。在豆瓣、微博上的某些由并喻文化主导的网络社区,“不婚不育保平安”这句略显极端的话语甚至成为社区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择偶的风险性和婚姻对个人自由的消解^[20],说明网络舆论环境强化了青年对婚姻的消极自我审视与负面认知构建。

2. 过高的择偶期待

随着婚姻和家庭功能的现代化,青年越来越注重婚恋的质量和情感契合。调查发现,青年择偶的三个重要标准依次是“三观相合”“人品/性格”和“经济基础”,既注重内在因素,也看重经济实力。这种“鱼和熊掌都要兼得”的过高择偶期待势必会增加配偶搜寻的难度,导致因匹配难而“忧婚”。有学者指出,当代部分青年对婚姻的期望恐怕是外貌主义、物质主义、浪漫主义、攀比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叠加^[21],他们不再会因满足了某单一标准而进入婚恋,反而可能会在相处时因为对方的某一个缺点而全盘否定。

“不将就”和“宁缺勿滥”的理想化择偶观或许会使青年陷入“刻舟求剑”的泥淖,造成择偶匹配受挫,而婚恋失意挫折的不断积压会让青年变得焦虑或沮丧,进而产生“懒婚”心态:当求之不得时不如安于现状。这种心态既是自我保护的合理化心理机制,也是自我解压的心理释放与逃避。当青年的择偶期待

无法实现而受挫后,就会产生较低的婚恋效能感,丧失对婚恋的激情,陷入失落、逃避的情绪,或者用“没时间没精力”作为逃避的借口,或者用“一切随缘”来自我安慰。本次调查显示,30岁以上的单身青年中35.7%有迫切的婚恋需要,25~30岁的单身青年中27.1%有迫切婚恋需要,这从侧面反映了很多都市青年在婚恋中的“佛系”心态。

3. 功利主义的婚恋观

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个体情感生活的入侵和解构,部分青年的择偶观呈现出功利化和世俗化的趋向,在择偶时更加看重“房子”“车子”“票子”等经济因素。在消费社会,商品逻辑具有普遍性,渗透于工作、娱乐、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2],婚恋关系亦不例外。电影《小时代》里有句台词:“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不用风吹,走几步就散了”,这种赤裸裸的对物质主义的宣扬鲜明体现了婚恋领域中很多青年对物欲的片面和极端化的追求。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使得爱情和婚姻成为人们理性计算、谋划博弈的砝码,经济收入、住房、职业地位、文化程度等易于量化和明确的指标是婚恋双方相互评价的重要标准。本次调查发现,当谈及婚房的花销应该由谁来承担时,选择愿意租房结婚的青年只有6.2%。由此可见,婚房已成为结婚的标配,除了子女教育、租房成本等现实因素的考量,功利主义的婚恋观亦是重要影响因素。这就导致缺乏经济实力的单身青年因经济压力而“忧婚”,从而限制了自身的婚姻决策。

4. 有待提升的婚恋能力

由于系统婚恋教育的不足,部分青年缺少关于两性差异、婚恋心理、婚姻角色与责任等婚恋知识储备;在两性交往、冲突解决、失恋后的心理修复等技能上捉襟见肘,阻滞了其亲密关系发展的进程,错失择偶良机,因此产生了负面婚恋态度。一是婚恋知识准备不足。由于缺乏对自我的准确认知,在择偶时往往无法寻找到在性格、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适合自己的合意伴侣;由于缺乏两性差异的知识,也不了解异性心理,在择偶时很难顺畅与异性沟通交

流。二是亲密关系建立与维系的知识与技能缺乏。网络社会的宅属性取代了现实社会中复杂的社会交往,使得部分青年的现实社交能力退化,不知道如何与异性相处并建立关系。即使找到约会对象,也缺乏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如沟通、冲突解决等技巧。一位被访男青年谈道:“如果说恋爱是一门学问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小学水平,在与陌生人相处中,很难开启话题”。三是失恋修复能力欠缺。“失恋”是恋爱中无法回避的一段历程。如何调整认知和情绪,尽快走出失恋的阴影、建立新的亲密关系,也是婚恋能力的重要方面。有些青年恋爱失败后选择“回避”,以避免再次受伤,错失择偶最佳时机。一位被访大龄女青年提道:“几年前失恋了,在那段感情中很受伤,后来好几年都不愿意触碰感情问题,现在想想那几年都荒废了,如果当时有什么服务机构或者什么人能够引导一下,可能也就快速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

四、影响单身青年婚恋态度的外在环境因素

当代青年经历着压缩现代化、个体化社会来临、消费主义流行等多重社会进程的叠加,个体对婚恋的态度呈现出发展性的变化,处于传统—现代这一谱系的不同位置,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并存的特点,既受困于传统社会的婚姻性别角色,也不断彰显现代社会独立自由的婚恋价值取向。单身青年认为,婚姻不仅要提供保障性、确定性的功能,还要实现情感价值,更要实现个体价值与自我实现与认同,这种对婚姻的理想化诉求使他们无法平衡自身发展和外部环境制约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中不断面临抉择与取舍。当现代职场生活不断压缩情感空间时,当亲密关系的建立有可能会对自我产生限制时,部分单身青年会对婚恋采取拖延逃避甚至恐惧的态度。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若能形成良好的婚恋素养,就能够以更加科学、理性和从容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上述婚恋中的矛盾和困扰,但是系统、全面婚恋教育的缺位使得部分单身青年产生了负面婚恋态度。

1. 现代化冲击下青年的工作与情感的冲突

现代化的发展是理性不断扩张的过程,强调工作和生活的效率,注重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现代工业社会的快节奏、高竞争对都市青年日常生活产生了时空挤压,在互联网行业、高新技术行业等工作领域,“白加黑”“996”“007”已成为职场青年的工作常态,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日渐模糊。职业“内卷”造成的超时工作侵蚀了青年的休息和休闲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不断挤压着年轻人的个人生活,导致了工作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一位被访男青年谈及了因工作时间碎片化而“懒婚”的无奈:“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生活节奏是很快的,而且我工作在市区,但是我家在通州区,通勤时间长,每天可利用的时间其实很少。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快餐式的生活当中,很难有耐心去投入经营一段感情。”

为了积累自身对抗现代风险的资源和能力,青年不得不在快速变幻的社会中奔跑忙碌。在面临工作与情感的张力时,他们增加了对情感风险的理性权衡,将时间和精力投放到工作和学习这些更能带来安全感和确定性的事物中,导致了生活中情感向度的缺失。2023年上半年北京青年流行的“上香热”中,媒体报道了“雍和宫长跪不起、红螺寺理都不理”这一“求事业不求姻缘”的矛盾现象,更有网友戏谑地将当下青年的爱情观调侃为:“用佛系的心态对待恋爱,用狼性的心态拼命搞钱”^[23]。因此,当亲密关系不再成为青年所关注的首要因素时,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对婚恋拖延逃避的“懒婚族”。

2. 个体化社会进程中青年的亲密关系与自我的张力

个体化是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同步发生的“人的解放”过程,即个人从中世纪的宗教信仰、社会体制和阶级隶属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被他人所决定”,而进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24]。中国的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发展加速了个体化社会的到来,约束个体行为的社会规范和制度性结构渐渐松散,个体实现了自由与解放,发展出强烈的“为自己而活”的动机和欲望。对于部分青年而言,当亲密关

系构建的归属感与“为自己而活”的自主感能够保持一致时,才会愿意进入亲密关系,而当他们认为二者存在冲突时,就会优先强调“自主”的需要,回归到强调自我的生活状态之中。来自个体化社会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点:只有当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感受到较高级别的自主时,关系中的归属感才能正向预测亲密关系的质量^[25]。

青年追求自主需要的满足无可厚非,然而,对个体主义的过分强调和认同会使得青年的“自我”疆域无限扩大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过度膨胀,进而产生一种自我和亲密关系是对立的偏差认知。有些青年把在亲密关系中应有的正常共情、理解和适当妥协视为对“自我”的侵犯。当亲密关系一旦触碰到“自我”的界限,与个体的工作事业、兴趣爱好等发生矛盾时,有些青年就会对亲密关系回避、拖延甚至恐惧。在“个体化”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下,青年往往只看到了亲密关系对自我的限制,而忽略了它对自我的拓展。

3. 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制约下青年的婚姻角色桎梏

随着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倡导以满足物质欲望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话语在与固化性别角色期待的传统性别话语相遇时,进一步强化了两性在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塑造和性别分工。因此,在传统父权制文化和社会性别观念的束缚下,“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角色桎梏对两性产生了不同的婚恋压力。本次调查发现性别因素对婚恋态度有重要影响,女性“恐婚”“懒婚”者更多,其婚恋动力低于男性;青年做出推迟婚恋决定的影响因素也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往往因为经济因素而“忧婚”,女性则因担心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而“懒婚”。

“结婚买房”“养家糊口”等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使得男性在家庭分工中常常扮演工具性角色,要面临为婚姻承担更多物质准备的压力。在结婚准备时,男性在物质责任方面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期待,有无婚房、婚房质量成为男性在婚恋市场中的关键竞争

力。经济实力低、没有婚房的男性更可能遭遇婚姻市场的挤压,从而因经济压力而“忧婚”。“生儿育女”“贤妻良母”等传统社会性别观念使得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常常面临“母职惩罚”的风险,要承担职场和家庭双重角色冲突而带来的压力。母职惩罚即女性因为母亲角色(或未来可能的母亲角色)而遭受的求职、工作评价、薪资、晋升机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与男性相比,部分女性在进行婚姻决策时会因为要承担婚姻生活责任而更加谨慎,从而更容易“懒婚”或“恐婚”。

4. 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系统、全面婚恋教育的缺位

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学习拥有健康的婚恋观念和足够的爱的能力是获得婚恋幸福的重要前提,但他们的成长历程中普遍缺乏全面、系统的婚恋教育,无法培养良好的婚恋素养,在面临婚恋问题时态度常常会消极负面。一是学校教育的不充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目前我国中小学鲜少开设两性教育的课程,大多数高校的婚恋教育课时少、内容比较窄,以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为主,对婚恋技巧、婚恋心理和性健康知识等实践性主题涉及较少,婚恋教育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26]。二是家庭教育的缺位。在中小学阶段,受传统保守观念影响,父母一般不会主动和孩子谈论婚恋和性相关的话题;在孩子进入婚恋适龄期时,父母也缺乏主动对子女进行婚恋知识和择偶观教育的意识或能力。三是网络教育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目前婚恋专家的微博和公众号、网络平台上的婚恋课程、社交平台上的经验交流群等已经成为青年汲取婚恋知识、分享婚恋态度的重要渠道,这些多元化的网络婚恋教育渠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青年婚恋教育的需求,但由于缺少监管和规范,使得网络上素质良莠不齐的婚恋“导师”对青年的婚恋观造成误导,而婚恋知识的碎片化和婚恋观的多元化也会对青年科学的婚恋教育形成冲击,造成青年婚恋在认知上的偏差和行为上的混乱等问题。

五、单身青年婚恋需求与供给的失衡

整合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认为,个人和社会资

源系统之间缺少良性互动可能是构成问题的原因,而导致社会资源系统无法提供人们所需要的资源、服务和机会的原因可能有:所需要的资源系统可能不存在,或者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资源;所需要的资源系统可能存在,但人们可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或如何使用它;所需要的资源系统可能存在,但在地理上、心理上或文化上对需要它的人来说是不可及的^[27]。深入考察单身青年与现有的各种婚恋资源之间的互动情况,可以发现青年婚恋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青年的婚恋需求日益多元化、精细化,对择偶安全性的要求也在提高,而现有的婚恋政策、公共服务供给和婚恋资源的品质不能很好地回应青年的这些需求,导致青年不愿或不能从社会资源系统中获得有效的婚恋帮助。当单身青年在婚恋中面临各种困难、迷茫和烦扰时,如果不能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中得到充分完善的保障与支持,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婚恋态度。

1. 青年婚恋需求的多元化与婚恋政策支持力度不强之间的落差

单身青年在婚恋方面存在多元化的需求:一是经济保障需求。对于都市新市民和低收入青年而言,需要通过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缓解因购买能力不足而产生的“婚房焦虑”。二是婚恋服务需求。青年的婚恋认知、心态和价值观存在很多误区和偏差,婚恋能力有待提高,需要通过婚恋服务加强对青年婚恋观的引导和婚恋教育、咨询与指导。三是资源保障需求。青年择偶存在社交圈小、匹配难等困难,需要拓展为青年提供联谊交流、交友约会、匹配推介等活动与服务的线上线下服务阵地与平台。四是权益保障需求。例如,超长劳动弱化了青年择偶的内在动力,需要切实保障“职场内卷”青年的休息权。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婚恋政策是政府治理青年婚恋问题的重要手段,《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等相关政策,对青年婚恋工作的目标与措施、内容与保障等作出了全面规定。但是,目前的婚恋相关政策

在满足青年多元化需求方面仍存在支持力度不强的问题:一是相关规定多为原则性的政策措施,这就有可能产生政策落实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强、保障不充分等问题,需要制定更为明确具体的婚恋政策,更好地回应青年的需求、缓解青年的婚恋焦虑。二是婚恋相关的青年政策存在欠缺与薄弱点,例如在住房政策方面缺乏对有结婚需求的适婚青年和新婚夫妻的优惠与保障政策,未能充分保障青年在结婚中的刚性需求。

2. 青年婚恋需求的精细化与婚恋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之间的落差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青年内部的分化更加复杂、细致。青年因城乡差异、收入高低、受教育程度不同,所面临的婚恋挑战也不同。群体差异直接导致青年精细化的婚恋需求,他们期待更加精准、专业和人性化的婚恋服务,而现有的婚恋公共服务供给与青年的期待之间尚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一是分众化服务欠缺。本次调查发现,“恐婚”“忧婚”“懒婚”等各类青年婚恋问题的原因不尽相同,所需要的服务重点、服务内容和形式也不同。不过,目前大多数婚恋服务是程式化的、大众化的,组织者很少会针对某一群体的特定需求开展精准服务,服务供给与青年需求之间出现错位。二是全链条服务不足。青年婚恋包含了择偶、恋爱、婚姻、分手或离异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可能遇到问题。但现有的婚恋服务往往只关注婚恋的某一阶段,缺少全周期、长链条的服务。一位被访青年谈到某公益性的婚恋交友活动时,认为“活动是非常好,但是都是一次性的,牵手后是否能真正走入婚姻,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面对,可惜就没人管了”,反映了目前交友跟踪、婚恋辅导等系列性服务供给的不足。三是体验性服务缺乏。相比讲课、说教等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当代青年更青睐体验式、活动式、启发式的引导和服务,希望通过生动有趣的体验活动和思想碰撞的分享交流来提升婚恋知识与技能、纠正婚恋中的认知偏差。遗憾的是,这种体验性婚恋教育和服务在现有的婚恋服务中并不常见。

3. 青年择偶安全性的需求与可信度高的婚恋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落差

陌生人社会带来了社会信任度的降低,加之婚恋市场中的婚托、“杀猪盘”等欺诈乱象侵蚀了青年对商业交友平台的信任,因此,青年非常注重择偶的安全性。本次调查显示,在北京青年的婚恋交友途径中,只有23.4%的青年愿意尝试通过“专业婚恋网站或商业类交友活动”择偶。比起商业机构,青年更信赖公益的交友服务平台,“单位或群团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的婚恋交友活动”在北京青年所选择的婚恋交友途径中位列第三。分析青年参加共青团组织的婚恋交友活动的调研数据发现,有半数单身青年表示没有听说过“共青团组织的婚恋交友活动”,39%的青年虽然听说过但没有参加过。也就是说,共青团组织的婚恋交友活动对单身青年的覆盖面不足10%,与青年需求之间的落差很大。总之,社会流动性带来的社会关系脆弱化以及生活场域陌生化,无法为青年自主择偶提供充分的社交场景,而青年对商业性的婚恋交友途径信任度低,他们信赖的群团组织的公益婚恋交友活动覆盖面往往较小。因此,缺少足够数量、可信度高、可及性强的婚恋交友途径成为青年择偶的掣肘,导致部分青年“恋而无门”,因匹配难而“忧婚”。

六、总结与建议

本文基于对北京市单身青年的实证调查发现,单身青年的婚恋态度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分化较大且负面态度凸显。因婚恋焦虑而“忧婚”的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对婚恋“佛系”或恐惧的“懒婚”“恐婚”态度亦成为不容忽视的新现象。本文在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下,以“人在情景中”为分析框架,从个体层面、社会环境层面、个体与环境互动层面,对单身青年分化鲜明的各类负面态度进行了精准、深入且全面的原因探究。综合来看,都市单身青年的负面婚恋态度是个体与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适应、妥协与建构形成的,体现了青年在婚恋场域中所面临的多重影响和制约因素。具体而言,功利主义的婚恋观、城市高

企的房价和住房政策保障的不完善是因经济压力而“忧婚”的主要原因;过高的择偶期待、有待提升的婚恋能力、全面系统婚恋教育的缺位、婚恋需求供给失衡是因匹配难而“忧婚”的主要原因;过高的择偶期待、有待提升的婚恋能力、工作与情感的冲突、亲密关系与自我的张力、传统婚姻性别角色的桎梏、婚恋需求供给失衡是“懒婚”的主要原因;非理性的婚恋认知、全面系统婚恋教育的缺位、传统婚姻性别角色的桎梏是“恐婚”的主要原因。负面婚恋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婚姻对都市单身青年的吸引力在下降,婚姻对很多人来说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尤其是女性对婚姻的态度更为审慎。虽然现有研究表明普婚仍旧是我国人口婚姻的突出特点^[28],但是单身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凸显反映了婚姻匹配难度在不断提高,进而加剧了青年结婚年龄推迟的状况。婚恋意愿的抑制可能会使更多的大龄单身青年徘徊在婚姻殿堂之外,甚至会滑入不婚的边缘,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长此以往,有可能会对普婚制度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整合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的焦点是人与社会环境中的系统之间的互动,关注的是人与影响着人们完成生命任务、减轻痛苦、实现愿望和价值观的能力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29]。因此,从系统性和整合性的视角出发,在青年婚恋问题中,社会工作干预的目标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高青年解决和应付婚恋问题的能力。作为改变推动者系统,社会工作者可以致力于推动学校和家庭具有自觉对青少年进行婚恋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改变青年针对婚恋的非理性认知和期待,发展青年的网络素养;在社会层面推动多方主体形成教育共识,让青年的婚恋素养在成长的各个阶段能够得到螺旋式提升,引导青年发展出理性、健康、平和的婚恋价值观和态度,促进青年婚姻性别角色的平等化变革。二是将青年与提供资源、服务和机会的系统联系起来,并促进这些系统的有效和人性化运作。在婚恋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应当倡导、推动并协助政府与社会各主体为青年婚恋提供更为充分的社

会资源系统,努力将青年与提供婚恋资源的系统联系起来,并促进婚恋资源系统的有效与人性化运作。三是促进青年婚恋相关政策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工作者在需求评估、制定、实施和成效评估的一系列婚恋政策实践的环节中都能发挥专业优势。社会工作者及其工作机构可以和共青团等团组织、民政局等职能部门构成政策改变与完善的推动者系统,与多元主体展开共同行动,推动婚恋政策的完善。

在具体方法和策略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提升青年婚恋素养,实现个体增能。推动学校教育把婚恋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从认知构建、态度/价值观引导、能力提升三个方面设置中学、高中、大学阶段相关课程,让青少年系统学习性别角色、两性知识、异性交往等婚恋知识和技能。推动社会层面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周期、长链条婚恋服务体系,可依托单位、社区、民政部门和网络公益教育平台,对青年牵手配对、交友技能指导、失恋修复、婚前教育和家庭建设等多个环节提供服务。二是丰富婚恋系统资源,促进青年与环境的良性互动。推动由政府主导和社会协同参与的婚恋、家庭咨询与服务网络的建设,搭建公益性、安全性高的线上交友平台。依托线上和线下平台宣传协助青年了解并获取相关的婚恋服务资源。协助婚恋服务机构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开展定制型服务,使青年和婚恋服务资源之间完成有效、人性化的链接与匹配。三是完善婚恋政策,营造包容支持的社会环境。建议推动出台全国性的《深化青年婚恋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于开展婚恋工作的内容、方法举措、保障方面进行更为细化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应当积极完善住房保障措施,缓解因经济因素而“忧婚”青年的后顾之忧。例如加强公租房对结婚需求的保障,可对经济困难的大龄新婚夫妇给予优先租赁权;推进“共有产权”结婚住房试点,开发建设政府与新婚夫妻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并支持新婚夫妻渐进式购买房屋全部产权^[3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EB/OL].<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

[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EB/OL].<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6rp/indexch.htm>.

[3]陈晨. 当代青年恋爱与婚姻状况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07(7): 64-68.

[4]秦琛,傅新禾. 青年婚恋观现状透析[J]. 当代青年研究, 2012(2): 28-32.

[5]李茂,刘鹏,王晨阳. 当代青年婚恋观念的现状特征及其引导策略研究——基于河北省的调查[J]. 社会科学论坛, 2021(4): 169-178.

[6][20]罗文. 代际传播视域下的两代人婚姻观研究[J]. 新闻传播, 2022(3): 20-22.

[7][11]Raymo J M, Uchikoshi F, Yoda S. Marriage Intentions, Desires, and Pathways to Later and Less Marriage in Japan[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21, 44: 67-98.

[8]张巍. 大都市单身青年“婚恋焦虑”现象调查及成因分析[J]. 当代青年研究, 2014(6): 112-116.

[9]戴颖洁,吕梓剑. 都市青年女性的晚婚潮: 女性主义与大众媒介的联姻[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12): 16-23.

[10]Leonhardt N D, Willoughby B J, Carroll J S, et al. "We Want to Be Married on Our Own Terms": Non-university Emerging Adults' Marital Belief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J].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022, 28(2): 629-651.

[12]廉思,赵金艳. 结婚是否一定要买房?——青年住房对婚姻的影响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7): 61-67.

[13]曾远力. 当代中国青年的婚姻实践[J]. 青年探索, 2019(6): 30-40.

[14]中国青年网. 团中央“青年之声”调查显示: 女性青年对婚姻更缺乏安全感[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1350798617837570&wfr=spider&for=pc>. 2018-05-24.

[15]吕梦醒. 论当代青年自我认同的发展困境与应对策

略——基于个体化理论的研究视角[J]. 甘肃社会科学, 2015(4): 57-60.

[16]封面新闻. 中国婚恋网、珍爱网发布《2022年Q4单身人群调查报告》揭秘单身人群恋爱消费[EB/OL].<https://www.thecover.cn/news/9930735>. 2022-11-11.

[17]Lesthaeghe R.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0, 36(2): 211-251.

[18]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19]沈奕斐. 什么样的爱值得勇敢一次[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 12.

[21]穆光宗. 当代中国青年婚恋状况分析[J]. 人民论坛, 2021(10): 26-29.

[22][法]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全志刚,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2-13.

[23]西二旗生活指北. 当代年轻人爱情观: 雍和宫长跪不起, 红螺寺理都不理[EB/OL].<https://www.163.com/dy/article/HTIA8E6J0541B9C9.html>. 2023-02-14.

[24]乌尔里希·贝克, 伊丽莎白·贝克. 个体化[M]. 李荣山, 范譞, 张惠强,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5]Kluwer E S, Karremans J C, Riedijk L, et al. Autonomy in Relatedness: How Need Fulfillment Interacts in Close Relationship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20, 46(4): 603-616.

[26]臧凯、杨威. 新时代大学生婚恋教育的基本架构与路径选择[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13): 63-66.

[27][29]Pincus Allen, Minahan Anne. *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 and Method*[M]. Itasca, Illinois: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nc, 1973: 7.

[28]翟振武, 刘雯莉. 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J]. 探索与争鸣, 2020(2): 122-130.

[30]喻燕, 吴泓庚, 关孝灌. 适婚青年“租房结婚”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房地产, 2020(9): 37-42.